

· 外论摘编 ·

试析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上)

爱德华多·德维斯·巴尔德斯 里卡多·梅尔加·鲍

过去,人们以东—西方阵营、东—西方世界的比喻象征世界的两极,今天人们又换以南—北这种重要比喻;然而,这些区划都低估或遗忘了在弱极内部的知识界和政治领域里的思想流动及人员联系。换言之,就是忽视了南—南间的思想联系与政治联系,特别是亚洲与拉丁美洲在20世纪的联系。在翻译、阅读、比较、吸纳亚洲思想经纬并与之对话方面,我们美洲大陆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我们一方面全面接受了欧洲和北美东方学家的文本,另一方面极其有限地直接了解到亚洲领袖人物的政治思想,比如圣雄甘地和毛泽东这两个我们最熟悉的例子。

基于这一现状,我们就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被吸纳的复杂、潜在过程提出第一个不完整的分析文本。众所周知,思想史一直遵循着由欧洲到拉丁美洲、由西方到东方的路线,请允许我们违反这一中心论体系。我们在本文中重新审视该问题的现状,将提出我们对该问题的解读,分析在占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心论背景下、亚洲思想如何成为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借鉴。我们将涉及拉丁美洲早期东方学的唯灵论(神智学的与印度斯坦的)分支和马克思主义分支,以及20世纪对拉丁美洲最有影响的亚洲思想家;最后,我们将以粗浅的总结结束本文。

这篇文章不是一个专门研究成果,这是两位学者向学术界提交的一种(知识)遗产,这样说并不是过谦之辞。我们并未为写这篇文章而进行研究,更确切地说,我们只是把零散的知识组织成文,旨在让这些思想丰富我们的知识库,同时启发今后的研究。

存在的问题与本文的方法论

研究亚洲思想在我们中间的影响只需要花费很

作者简介:爱德华多·德维斯·巴尔德斯(Eduardo Devés-Valdés)任职于智利圣地亚哥大学高级研究所;里卡多·梅尔加·鲍(Ricardo Melgar-Bao)任职于墨西哥人类学与历史国立研究所。

小的气力,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同样众所周知的是,直到现在我们仍没有一个对现状的粗线条介绍。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从英语和法语译本翻译了少量亚洲思想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英、法语译本是西方的东方学家从东方语言直接译出的原著选篇,而我们甚至没有清点过这批本大陆知识分子的转译作品篇目。是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Ventura Garca Calderon)和乌拉圭记者卡洛斯·德安布罗西斯·马丁斯(Carlos Deambrosio Martins)使我们首次接触了在欧洲传播的印度思想。前者将《摩奴法典》(Manava - Dharma - Sastra)一书的法文版翻译成西班牙文,由巴黎的Gamier Hermanos出版社出版;后者翻译了罗曼·罗兰关于印度的一些文章。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位名为胡安·

本文译自西班牙文“El Pensamiento de Asia en America Latina: Hacia una Cartografa”,原文载*Revista de Hispanismo Filosofico*(2005年第10期)。本译文已获作者书面授权。

唯灵论:主张灵魂和精神是世界本原的宗教和唯心主义哲学学说。它最初出现于19世纪下半叶的德国,后又流传到英、法等国。唯灵论宣称,灵魂是唯一的,世界万物都是有灵魂的,地球有“地球灵魂”,世界有“世界灵魂”。唯灵论所说的“世界灵魂”,是一个包括一切的大灵魂,也就是上帝。其他一切灵魂,都是包括在这个大灵魂中的小灵魂。世界的存在不过是灵魂的外化。世界的统一,就统一在上帝这个大灵魂中。——译者注

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1886-1959):秘鲁作家、外交家、学者,一生大部分时间旅居巴黎,作品多为法语,内容涉及秘鲁及安第斯地区,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这本书西文还称*Las Leyes de Manu Instituciones Religiosas y Civiles de la India*,最早是由法国东方学者卢瓦瑟勒·迭朗善(A. Loiseleur Deslongchamps)由梵语翻译成法语并在这家Gamier出版社出版,序言由这位学者撰写。1年后,本图拉·加西亚·卡尔德隆将迭朗善的法语版译成西班牙语并在该出版社出版,但Gamier出版社没有出版年份,根据该出版社其他相关资料,笔者推测其出版时间约为1900年左右。

罗曼·罗兰在《印度的觉醒》(*El Despertar de la India*, 1929)一书的注释17中,感谢卡洛斯·德安布罗西斯·马丁斯将其文章《前进中的印度》(*La India en Marcha*)翻译成西班牙语,该文收录在他撰写的《圣雄甘地传》(*La Vida de Mahatma Gandhi*, 1930年布宜诺斯艾利斯光明出版社,第60页)一书第三版附录中。

爱德华多·德维斯·巴尔德斯 里卡多·梅尔加·鲍
试析亚洲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

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何塞·塔布拉达 (Juan José Tablada) 的墨西哥人，他曾于 1900 年访问了日本，同年发表了几篇有关于日本思想、艺术及礼仪的文章 (参阅本文附录“书目”，下同：Tablada, 1900)。随后，出现了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José Vasconcelos)、维多利亚·奥坎波 (Victoria Ocampo)、维森特·法托内 (Vicente Fatone)、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古斯塔沃·巴尔加斯 (Gustavo Vargas) 及费尔南多·托拉 (Fernando Tola) 等一批东方学家以及第一批直接由原文译成西班牙语的译著。例如：由卡门·德拉戈内蒂 (Carmen Dragonetti) 自巴利语 (Pali) 译成西班牙语并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无问自说经：佛的话》(2002) 一书。

在拉丁美洲，亚洲思想的被认知度低于西欧或是北美的思想。它的地位也许和斯拉夫地区的思想相仿，从较长时间范围来看，亚洲思想比非洲思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思想，更不用说比大洋洲的思想有更大的吸引力。造成上述现象的部分原因被秘鲁当代社会学家阿尼瓦尔·基哈诺 (Anibal Quijano) 确切道出：我们的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处于次要和附属地位，这使得我们的学术及政治思想带有西方殖民化和现代化特征。一种简单但普遍的观点认为，拉美思想 (这里指“知识界”或“高深”的思想，而非指大众文化) 是以欧洲 (或有限程度上的北美) 的巨大影响、加上土生白人—印欧混血人微不足道的影响为基础形成的。这种主流观点，并非绝对错误但有些简单化，持这种观点的人无法细致入微地观察那些来自于非西方文化的多样化的思想潮流是如何来到我们大陆的。

资本与商品的主导流向与思想的主导流向并行不悖，这种说法并不新鲜。但是此前并没有人从上述现象中继续分析，提出我们拉美大陆对亚洲思想的接受问题。更确切地说，拉美大陆对非主流地区思想的接受过程——如对我们所涉及的亚洲思想的接受过程——虽然没有受到蔑视，但却处于学术研究的边缘地位，下面我们会进一步分析这种情况。这种现状也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本大陆自己的东方学者及相关研究机构尽管在 20 世纪后期获得了一定的国际认可，但总的来说在学术界影响非常有限。

尽管我们的东方研究充满了在我们学术环境中占统治地位的西方偏见，但是总的来看，我们对亚洲思想的接受反映了拉丁美洲大陆是一个世界性地区的历史特点。在世界市场形成的 16 世纪，尤其

是在 20~21 世纪，亚洲及其思想与我们的拉丁美洲不无关系；而且，亚洲思想的流动并没有局限于太平洋途径。“文化传播学” (difusionismo) 者对美洲起源的本土性提出质疑，他们的观点震动了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同时，对美洲居民形成过程的研究也强化了亚洲来源的证据。关于伟大安第斯与中部美洲文化起源于亚洲的说法，以及关于如毛主义者提出的亚洲可以为拉丁美洲革命道路提供借鉴的说法，则引发了更大的争议。

由于在印度从事外交工作之便，墨西哥诗人、散文家奥克塔维奥·帕斯得以与亚洲知识分子及欧洲东方学者进行公开、直接的对话。帕斯关注如下两方面的思考并就此进行了交流：一方面，关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前亚洲与美洲联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关于中部美洲及亚洲历史轨迹的差异性，两者的历史轨迹分别受制于各自的重大文化变迁。帕斯对文化传播学派关于美洲的“亚洲起源说”持坚定的批判态度。然而，这位墨西哥散文家却为亚洲的文化影响力震慑：

“亚洲起源说不能使我信服，却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说我的理智否定它，但我的感觉却接受它。而对于我来说，感觉提供的证据并不比理智提供的证据份量轻。几年以来我一直生活在东方，我不可能不看到墨西哥与印度的许多相似之处。” (Paz, 1989: 92)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1881~1959)：墨西哥著名思想家，在青年中被誉为“青年导师”“美洲导师”，主要著作《宇宙种族》(La Raza Cósmica)。

维多利亚·奥坎波 (1890~1979)：阿根廷学者、著名女作家，阿根廷杂志《南方》的创始人及出版人。

维森特·法托内 (1903~1962)：阿根廷哲学家，主要研究自由与神秘学。

奥克塔维奥·帕斯 (1914~1998)：墨西哥著名文学家，199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为诗歌及杂文。

古斯塔沃·巴尔加斯：哥伦比亚籍旅居墨西哥学者，拉美最早提到“扶桑国” (Fusang) 的人，曾著《扶桑：哥伦布之前美洲的中国人》(1990) 一书。

费尔南多·托拉：秘鲁当代东方学家、学者、作家，曾写作、翻译多部有关印度文化的著作，尤其关于印度文学、宗教哲学中的佛学、神秘学著作，曾编辑《无问自说经：佛的话》一书西班牙文版。——译者注

卡门·德拉戈内蒂：阿根廷当代作家、学者，阿佛教研究基金会研究所 (FIEB) 主席，主要研究印度哲学。——译者注

下文提到：有人提出了拉美人的祖先是跨越太平洋的亚洲移民后代的逻辑。这一移民问题已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引起了一些“本质论者”带有意识形态的发挥，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受到激励。——译者注

指包括墨西哥与中美洲在内的地区。——译者注

观察印度的墨西哥视角影响了帕斯对世界历史的看法，他强调两者间的许多相似之处超出了各自的民族舞台，体现了西方化、殖民主义以及世界市场进程间复杂的内在关系。

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面对繁复的亚洲思想世界，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困惑绵延徘徊于整个 20 世纪，这一特征使得拉美对亚洲思想的接受呈现了不连贯性与多样性的特点。拉美知识分子感到很难为亚洲思想确立准确的哲学、宗教或政治的界限，这是拉丁美洲在接受亚洲思想过程中的一个特征。如阿根廷人胡里奥·纳瓦罗·蒙索 (Julio Navarro Monzó) 在上个世纪 40 年代初广泛阅读了日本民族主义者田中智学 (Chigaku Tanaka) 的文章后，惊奇地发现日本神道的原则与柏拉图的某些思想相似，比如，后者关于直觉 (noesis)、理智 (dianoia) 以及关于“理性” (logos) 与“感性” (eros) 关联的思想。纳瓦罗以日本神道与柏拉图主义的这种契合性勉强解释圣经第四卷福音书中关于“理性” (logos) 的分裂以及人类多样性的内容。(Navarro, 1946: 175 - 176)

亚洲文化中的政教结合具有保守、革新及革命等不同侧面。除了颇为流传但极具争议的印度甘地运动的经验，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和 40 年代初，日本法西斯主义思想在拉美也得到了传播的空间。正是如此，久原房之助 (Fusanosuke Kuhara) 有关一党制及需要政教合一支持国内外“整体意志”的思想在阿根廷知识界得到了一定的传播，他的著作在拉美地区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出版。久原房之助这样概括其一党制规划的目标：

“……将全体人民团结为完整的集体，同皇室统治合作，忠于‘一人执政之下，万人均臣民’的原则，这意味着基于全民族团结的全体人民及政府意志的绝对结合与和谐。”(Kuhara, 1941: 13)

积极接受亚洲思想的拉美人，在困惑与被吸引之间徘徊，在批判性赞同或绝对赞同间犹豫，在为我所用与拿来主义间摇摆。智利哲学家恩里克·莫利纳 (Enrique Molina) 认为在印度古典唯灵论者思想深处发现了西方现代哲学唯灵论的关键，后者的代表如黑格尔、R. 欧根 (Eucken)、冯·尤克斯奎尔 (Von Uexküll)、柏格森与斯托特 (G. F. Stout) 等。(Molina, 1947: 128)

他的这点困惑值得讨论。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他看到了亚洲唯灵论哲学思想出现的历史过程。阿根廷神学家、东西方比较研究所所长伊萨梅

尔·基莱斯 (Ismael Quiles) 与东方思想接近的过程尽管出于传教目的，但在旅日归来后，他承认自己受到了东方思想的巨大影响：

“提到内涵，我深深为东方文化的博大精深折服……一开始我遇到了与东方对话的困难，与印度教思想及佛教思想对话的困难，我现在主要说的是印度教与佛教，尽管我也可以就道教说同样的话。我发现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间的巨大差异，两者的感悟方式也相去甚远。事实上，所有我们在西方谈论的内容同样在东方探讨着，但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不同的侧重完全改变了整个局面和观点。”(Quiles, 1978: 156)

对毛泽东的著作和领袖地位的崇拜是更为熟知并广为流传的，这一点在上个世纪 60 ~ 80 年代拉丁美洲各个毛主义流派中毫无争议，直到在拉丁美洲本土引起异议，比如秘鲁的倍受争议的“贡萨洛思想”提出的异议。

同时在一些拉丁美洲的东方学者中也出现了不无根据的批评态度，如阿根廷人维森特·法托内对于殖民地时期印度的批判。他批评了不仅针对印度知识分子也针对他本人印度之旅的英国新闻检查，但他也批评了当地种族中心主义者：

“印度人认为我们这些西方人简直就是‘野蛮人’……他们认为他们的精神生活境界比我们高很多。”(Fatone, 1942: 87)

有几条线索让我们了解到拉丁美洲对亚洲思想的零散介绍。在较通俗的层面，拉丁美洲把道德与政治的东方式结合视为可以追随的理想。于 1921 年上台的一届墨西哥政府罕见的正直态度被人们当作儒家道德的到来而受到庆祝，墨西哥首都的著名刊物《杂志之粹》(Revista de Revistas) 登载了这样的文字，另一份正在整个美洲大陆获得声誉的杂志《美洲一览》(Repertorio Americano) 也登载了同样的消息。(Castillo, 1921: 170 - 171)

另一方面，我们知道自 20 世纪初以来，就有人从颇有争议的“文化传播学”角度考察印第安文化中的亚洲元素，同时关于美洲人种起源的重要问题，有人提出了他们是跨越太平洋的亚洲移民后代的逻辑。这一移民问题已超出了历史学的范畴，引起了一些本质论者带有意识形态的发挥，并在第

秘鲁游击组织“光辉道路”1970 年从秘鲁共产党中分离出来，“贡萨洛思想”由其领导人、化名“贡萨洛”的原秘鲁共产党员阿维马埃尔·古兹曼 (Abimael Guzmán) 创立。——译者注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受到激励。于是，胡里奥·纳瓦罗·蒙索提出了一个带有浓重种族主义者色彩的不可思议反法西斯幻想，希望向日本帝国主义的特洛伊木马中的印第安美洲氏族部落回归：

“被称为原住民的美洲居民拥有遥远的亚洲祖先，这个古老的祖先从墨西哥到麦哲伦海峡，对于日本的行动表示了惊人的共鸣……如果日本对美洲原住民采取一次文化行动，或者神道主义在库斯科的废墟上重建太阳崇拜，那将会怎样？”(Navarro, 1946: 18)

在接受者或困惑或迷恋的反映中，我们发现了拉丁美洲文化和思想中的亚洲踪迹，这些印记不仅存在于殖民时期，也来自 19~20 世纪中国、印度、日本和奥斯曼帝国劳工移民带来的文化遗产。亚洲思想对本大陆的影响可以追溯到 1900 年以前，但到了 20 世纪，拉美地区对亚洲思想的接受才取得长足发展。

20 世纪亚洲一流学者及政治人物的影响反复出现在拉丁美洲人的思想和文字中，如泰戈尔、甘地、孙中山、毛泽东、胡志明、武元甲 (Nguyen Giap)，他们有着广泛影响。尼赫鲁、金日成、苏加诺、霍米·巴巴 (Homi Bahbah) 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Spivak)，以及纳赛尔 (Nasser)、本·古里安 (Ben Gurion，波兰籍以色列人) 等跨大陆人物，也在拉丁美洲知识界和政界成为被翻译、阅读、提及和讨论的人物。在下文中，我们也将介绍拉丁美洲人如何接近并非由知名人物代表的亚洲思想，比如，我们将看到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如何努力发掘并反思那些促成亚洲重大社会运动的思想力量 (如 1919 年的北京学生运动，中国文化大革命，等等)。应该明确的是，本文论及的“思想”是严格意义上的概念，不涉及在文学、艺术或者日常习俗方面反映出的亚洲影响。

本文基于四个基本概念而成：思想 (在边缘化世界) 的流动，知识分子网络，处于边缘地位的思想，对外来思想的接受 (外来思想的存在、对外来思想的重新诠释，对外来思想的吸收)。基于上述概念，我们将梳理亚洲思想在拉美的影响以及拉美在 20 世纪对亚洲思想进行的改造。

事实上，我们的研究方法中缺少通向了解比如下述思想的途径：东欧 (或曰斯拉夫) 欧洲思想，阿拉伯或伊斯兰思想，第三世界思想，下撒哈拉非洲思想，与“基布兹”有关的现代以色列思想

(非指圣经中的以色列思想) 等。西班牙内战期间，人们开始注意到知识分子的迁徙，但是，有人注意到叙利亚、黎巴嫩或者俄国知识分子抵达拉丁美洲的情况吗？我们在此仅仅探讨了思想层面，尽管我们知道在诗歌、造型艺术、电影、音乐、舞蹈、烹饪学、宗教、草药、传统医学等其他文化领域都能发现对亚洲因素的吸纳，都能发现其中的非欧洲根源，当然我们也不会把这些领域混为一谈。

当谈及“亚洲思想”或“亚洲地区的思想”时，我们并非意指 (当然也没有否定) 亚洲思想具有超出各自地缘政治范围的一致性。我们并没有把作为诗人和精神大师的哈里利·纪伯伦 (Khalil Gibran)、经济学家拉奥 (V. S. Rao)、神道民族主义者田中智学与政治领袖毛泽东一概而论。

我们只是希望呈现一个广阔世界的存在，一个拥有来自非西欧、非美国——尽管他们的到来常常借助了西欧和美国的途径——的作家与思想的世界，他们影响了拉丁美洲，或者受到了拉丁美洲思想界的重新阐释。

亚洲如何启发了拉丁美洲 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

面对无所不在的欧洲文化遗产，拉丁美洲知

武元甲 (1911~?): 越南人民军创建人之一，越著名军事政治领袖，越南抗法战争期间主要领导人之一。——译者注

霍米·巴巴 (1949~): 印度著名后殖民理论家，与赛义德 (Edward Said) 和斯皮瓦克 (Gayatri C. Spivak) 一起被誉为后殖民理论的“圣三位一体”，其主要批评著作有《文化的定位》以及他主编的《民族与叙事》等。

佳亚特里·斯皮瓦克 (1942~): 出生于印度，当今世界著名文学理论家和文化批评家，西方后殖民理论思潮的主要代表。——译者注

纳赛尔 (1918~1970): 埃及第二任总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重要的阿拉伯领导人之一，20 世纪 50~60 年代中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倡导者。

本·古里安 (1886~1973): 以色列第一任总理，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领导创建以色列国，被视为现代以色列国父。——译者注

基布兹是一种社会主义集体公社。成员共同劳动，按需分配，实现内部民主和平等，第一个基布兹成立于 1909 年。创业先辈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他们受社会主义理想影响，在当时巴勒斯坦北部加利利湖地区的德加尼亚建立了一个由工人成员拥有的独立农场，称 Kvitza (希伯来语，意为“团体”)。——译者注

哈里利·纪伯伦 (1883~1931): 黎巴嫩诗人、作家、画家，被称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骄子”，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和艺术散文的主要奠基人，20 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译者注

识分子一直努力使自己的思考本土化，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并没有重视借鉴亚洲的经验，不过也出现了一些例外的逆潮流思想家。

1919年得到鲁迅鼓舞的中国学生运动的影响超越了国界，大概是由于这场运动对帝国主义的掠夺干涉提出了质疑，并对本国政府施压，要求它在山东问题上维护国家的尊严，因而使这场运动的目标带有民族性。在这种形势下，一群哥斯达黎加大学生精英的行为引人注目：面对一年前在阿根廷科尔多瓦发生并席卷整个大陆的同等重要的大学改革运动，他们却以更大的热情关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国学生运动的传播者是美国著名的学生运动撰稿人、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杜威是中国学生运动的见证人。他在去中国之前就曾在伯克利大学的学术圈里通过一系列讲座表露了自己的东方学者身份。杜威曾从中国寄出了热情洋溢的文章，介绍中国的学生运动，影响了伯克利大学的哥斯达黎加学生。其书信文献中有一封是寄给《美洲一览》负责人华金·加西亚·蒙赫（Joaquín García Monge）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这里读了这篇文章，我们同其他哥斯达黎加人探讨过，并计划在哥斯达黎加可以做些什么，却不知道与此同时，这里正发生着女教师的革命。”（Ortizco, 1921: 124）

上个世纪20年代前五年，亚洲民族主义革命运动浪潮高涨，唤起了拉丁美洲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趣。在大学改革运动中脱颖而出的年轻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面对陈旧的、精英主义的实证主义话语，敏锐地寻找“新思想”和“青年人的导师”，同时支持在纪念独立运动一百周年之际重新举起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我们应注意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与国民党有关的、旅居拉美的中国知识分子、政治家及外交家所起到的作用。

墨西哥哲学家安东尼奥·卡索（Antonio Caso）在其一篇文章中回忆了与中国驻墨西哥代表、（1921年）纪念秘鲁独立一百周年活动特使 Yo Sat Yen 博士的早期会面。被道家思想吸引的卡索觉得 Yo Sat Yen 是一位难能可贵的对话者。正是这位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国外交官，将意大利汉学家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的《古代中国哲学故事》一书赠给了卡索，希望他能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尤其是道家思想。卡索则表示，他是在后日里读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ardo Wilhelm）的著作，才真正满足了自己对道家思想的好奇心。

（Caso, 1936）我们据此推断，欧洲东方学甚至也成了中国人传播思想的中介。毫无疑问，从中文到西班牙文的哲学翻译作品看来由于稀缺而闪光，并由西方汉学家的著作得到补充。

在政治思想方面，倒确实有过著名的亚洲撰稿人，如在墨西哥改信马克思主义之前的印度人罗易（Mananbendra Nath Roy），还有秘鲁的中国人 Chan On Yen。国民党 1928年在利马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由蒋介石推动的右倾政治转折，来自利马华人区的 100多位成员参加了会议。大会由 Chan On Yen 博士主持，他是这个中国政治组织思想与纲领的主要传播者。这次会议并非无人注意，如果我们留心就会发现，对它的报道占据了主要全国性日报的头版位置。

经历过“大学改革”的一代人主办的所有杂志都在自己的刊物里登载过关于亚洲民族主义思想和亚洲唯灵论思想的翻译文章，以及从政治角度弘扬印度与中国反殖领导人的文章。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著名西班牙-阿根廷出版者弗朗西斯科·萨莫拉（Francisco Zamora）在 1924年底为获得成功的“思想者”系列丛书划上句号之际，出版了 5本关于罗曼·罗兰和圣雄·甘地的书。（Ferreira, 1998: 92）1924~1930年间，罗曼·罗兰所著《圣雄甘地传》一书由弗朗西斯科·萨莫拉在光明（Claridad）出版社三次再版，这是东方学在拉丁美洲呈上升趋势的明显标志。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中期光明出版社的丛书在拉美主要城市的发行都很成功。

在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的头脑中，罗兰的东方主义与甘地的印度本土化主义（nativismo）往往失去了意识形态的边界。拉丁美洲大陆在翻译、阅读亚洲著作的过程中，在与亚洲思想对话、将之与自己对比、直至吸纳亚洲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表现出一种很大反差，一方面接受欧洲和北美东方学者的文本，另一方面对亚洲领袖的政治思想知之甚少，比

罗易在墨西哥出版了题为《印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La India su Pasado, su Presente y su Porvenir, 1918），在其序言中写到：“谨以本书作为感谢墨西哥人民的厚礼，感谢他们对于印度人民争取独立斗争所表达的同情。”——原书注

罗易（1887~1954），亦译作鲁易、鲁依，印度革命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及活动家。早年曾为共产主义领袖及理论家，在墨西哥、印度及中国参与领导共产主义革命；后宣扬其“新人民主义”。——译者注。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代表大会”，《（利马）编年史》（La Crónica (Lima)），No. 5333, 1928年6月13日。

如对圣雄甘地和孙中山这两位我们最熟悉的人物。

上个世纪 30 年代，东方学在西方化色彩很浓的拉丁美洲哲学界开辟出一些空间，例如拉美哲学界的恩里克·莫利纳以亚洲思想为借鉴，大胆提出为建立拉美大陆新型唯灵论进行反思的任务：

“印度一直是唯灵论哲学的传统地区。在这块土地上有许多表现方式反映出人们相信存在一种无所不在的、统领一切的、不朽的、永恒的精神，人类的灵魂不过是这种精神的本质和实体发出的无数火花。

这种普遍精神的观念，大体上规范着世界的运动，支撑并引导人类的生活，标示出道德价值的底线；在不少现代或当代哲学体系中，我们都能找到仅有细微区别的另一观念。”(Molina, 1947: 112)

智利哲学家恩里克·莫利纳写了一篇有争议的文章，为西方化了的拉美人提出了“整体文化”这一理想；如果他没有在这篇文章中加入东方文化的话题，我们是不会注意他的文章的。莫利纳的思想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提出了标新立异的想法，认为在亚洲思想中存在着先于现代或当代西方哲学的唯灵论哲学基本思路；另一方面，他推崇欧洲古典时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某些辉煌阶段。在东方与西方间徘徊的莫利纳看到了一种可能性，至少是表达了一种愿望，即“伊比利亚美洲民族”以雅典时代的古希腊人、凯撒大帝时代的罗马人、文艺复兴时代的佛罗伦萨人以及“最先进的欧洲各民族”为楷模，实现与“坚实的物质进步和谐”发展，创造出一个精神的辉煌时代。(Molina, 1947: 203, 206) 莫利纳认为，理想的唯灵论，对于我们大陆来说，一方面应该摆脱那些宣传佛教、《博伽梵歌》(El Bagavad Ghita) 以及宣传甘地“忍让和放弃”立场的东方学家的误区，另一方面，也要摆脱在我们自己的环境中形成的唯灵论，面对着帝国主义的强势，我们的经济地位低下，这种低下的经济地位使我们在精神上也处于颓唐的环境。(Molina, 1947: 203 - 205)

巴西哲学家阿图尔·贝尔夏尼·贝洛索 (Artur Versiani Veloso) 依据亚洲思想在《哲学史入门》(1947年) 一书中对哲学史中的欧洲理性中心的传统观念采取了保留态度，他在书中主张人们了解《奥义书》(Upanishads)、佛学等日本与欧亚大陆的哲学思想。(Jaime, 1999: 321)

印度思想、神智学 (teosofía)、非基督教运动 (paganismo) 与佛教

拉丁美洲第一次明确接纳来自亚洲的思想是在 1900 年左右。可以在整个大洲许多作者的作品里看到涉及亚洲哲学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与精神层次问题的论述。这是反对实证主义、反对科学至上的时代之风的表现之一，而不单纯是“东方主义”的表现。

亚洲思想有时伴随着人们对古典思潮的弘扬而出现，如在罗伯托·布雷内斯·梅森 (Roberto Brenes Mesén), 奥马尔·登戈 (Omar Dengo) 及莫伊塞斯·文森西 (Moisés Vincenzi) 等中美洲“异教徒”思想流派的著述中，有时出现在对种族和社会问题的论述中，如推崇混血文化和印第安文化的多拉·马耶尔 (Dora Mayer),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等作家的表述，甚至一位生态保护主义者恩里克·戈麦斯·卡里略 (Enrique Gómez Carrillo) 也在自己的论述中涉及了亚洲思想。(Marta Casa ú 2001 y Eduardo Devé 2000)

《奥义书》, 印度教古代吠陀教义的思辨作品，为后世各派印度哲学所依据。《奥义书》即具有深刻含义的典籍，是印度圣书。印度的宗教哲学多是从《奥义书》发展而来，千百年来对印度文化和西方文化均产生了巨大影响。《奥义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 9 世纪左右。——译者注

神智学 (Theosophy) 来自希腊文神和智慧两个词。它的很多概念来自 2000 多年以来溯源于毕达哥拉斯的神秘思想，德国神秘主义者波默 (Jakob Boehme) 对神智学也有很大影响。神智学通常是指探索人与宇宙或神关系的神秘哲学思想。神智学的三个目标是形成一个超越于种族、宗教和社会阶级的普遍的人类兄弟情谊；研究传统宗教、哲学和科学；探索自然法则以开发潜藏在人类中的神秘的精神力量。该思想产生与当时进化论给基督神学带来的空前危机有关，科学与宗教的矛盾空前尖锐，神智学以宗教的形式发展进化论，试图走出一条中间路线。他们认同进化，认为人正是通过不断的轮回而逐渐进化，通过获得神圣的知识来加快进化，最终成为圣者。神智学创始人是俄罗斯著名女性布拉瓦茨基 (Helena Petrovna Blavatsky, 通常被称为 HPB) 与美国人奥尔科特 (Henry Steel Olcott), 他们于 1875 年创立了神智学会 (Theosophical Society)。其他重要神智学人物还有贝赞特 (Annie Besant) 等人。著名精神导师克里希那穆提 (Krishnamurti) 早期也是神智学者，被当时的神智学者认为是佛陀化身，后离开神智学会。他认为真理不可能通过一种有组织的宗教来获得，而只能是个人。神智学影响了西方很多文学艺术、新兴宗教，还产生了人智论 (anthroposophy)、神智学和通灵理论与新时代 (New Age) 思想结合等。——译者注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 智利著名女作家和诗人，1945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拉丁美洲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诗人。——译者注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往往表现为神智学的“东方主义”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如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及布拉瓦茨基夫人（Mme Blavatsky）等非东方作者传播的。泰戈尔是被东方学家引述最多的人。这一形势持续了几十年，并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衰落（但并未消失）。

在接受泰戈尔思想的同时，拉美知识分子也接受了来自几个方向的神智学，如克里希那穆提（Krishnamurti）、Jinajardasa、辨喜（Vivekananda）等印度学者，（作为介绍者的）布拉瓦茨基、贝赞特等欧洲学者，以及陆军上校奥尔科特（Hemy Steel Olcott）等美国学者。波多黎各人佩德罗·阿尔比苏·坎波斯（Pedro Albizu Campos）采纳了民间天主教的某些象征并坚决将其本土化，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构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过程中，有泰戈尔的神智学传统、唯灵论教诲和反对殖民主义思想融合的影子。

阿尔比苏·坎波斯 21 岁时曾在美国上大学，据他的独立运动者同道胡安·安东尼奥·科雷费尔（Juan Antonio Corretier）说，坎波斯在大学时期接受了神智学及红玫瑰十字教派。在阿尔比苏出生的城市庞塞，于 1903 年成立了神智学团体“Lumen”，参与者包括罗森多·马廷索·辛特龙（Rosendo Matienzo Cintrón）与托马斯·卡里翁·马杜罗（Tomás Carrión Maduro），他们是波多黎各第一次独立运动中最著名的两位人物。（Ferrao, 1989 - 1990: 228 - 229）旅居美国期间，阿尔比苏·坎波斯在关注泰戈尔思想的同时，也关注爱尔兰人辛·费恩（Sin Fein）的反殖天主教理论与行动。（Alzéneca, 1989 - 1990: 256）

阿马多·内尔沃（Amado Nervo）与桑蒂诺（Sandino）（Wuderich, 1995），巴斯孔塞洛斯与马斯费雷尔（Masferrer）（Casa ús, 2001），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与秘鲁阿普拉党创始人阿亚·德拉托雷（Haya de la Torre），他们都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在各自的文字中表露了对东方思想的了解，我们通过第三者的转述也了解到他们在行为中对招魂术（espiritismo）、香熏等东方习俗的热爱。这样的拉丁美洲知识分子不胜枚举。

何塞·巴斯孔塞洛斯在其《印度斯坦研究》一文中，记述到“过去，我们对东方学少有研究；对这个领域最初的热忱产生于 8 年前那几次难忘的会议，当时我与安东尼奥·卡索、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Pedro Henríquez Ureña）、阿方索·

雷耶斯（Alfonso Reyes）在墨西哥聚会，回顾了所有直接影响精神世界的事件”。（Vasconcebs, 1938: 10）然而，在这些人的书信集中关于东方学家的脉络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在阿方索·雷耶斯与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的通信中，东方学的脉络甚至因缺位而闪光，以至于通信集的编辑者和前言作者超出了主题概述道：“书信中没有任何关于东方的内容，无论是文学的抑或是思想的。巴斯孔塞洛斯随后对佛教与印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被视为一种个人的开拓性行为。”（Martínez, 1986: 27）

墨西哥“文学会”（Ateneo）的朋友中间存在着东方学氛围，巴斯孔塞洛斯的这一评价是站得住脚的，事实上，这种东方学氛围的历史还要久远。早在 19 世纪末，何塞·马蒂、鲁文·达里奥（Rubén Daró）与阿马多·内尔沃等著名人物已经掀起了东方主义的第一波浪潮。进入 20 世纪后，在墨西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文学现代主义者与“爱丽儿主义”（Arielismo）思想家心中扎根并广为传播的东方热日渐明显。

以上情况并没有什么独到之处。这种东方主义不是通过我们与东方知识分子的联系获得的，而是借助欧美知识分子的法译本、英译本，以及少量西班牙语译本得到的。我们的东方研究当然是二手甚

亦音译为斯哇密·维韦卡南达。原名纳兰德拉那特·达泰，法号辨喜（1863~1902），印度近代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和印度教改革家，被英国历史学家誉为“现代世界的主要奠基者之一”，是最早在西方传授瑜伽和冥想的导师之一。——译者注

阿马多·内尔沃（1870~1919）：墨西哥著名诗人。马斯费雷尔（1918~1975）：古巴游击战领导人、律师、国会议员、报刊发行人、古巴共产党员，在美国迈阿密被杀害。——译者注

安东尼奥·卡索（1883~1946）：墨西哥哲学家，“后实证主义”新思想宣传者，墨西哥唯心主义奠基人之一，同何塞·巴斯孔塞洛斯一起创立了墨西哥“文学会”。

佩德罗·恩里克斯·乌雷尼亚（1884~1946）：生于多米尼加，拉丁美洲思想家，墨西哥“文学会”重要成员之一，主要著作有散文《美洲的乌托邦》等。

阿方索·雷耶斯（1889~1959）：墨西哥“青年协会”重要成员之一，墨西哥非纯粹哲学意义上的思想家。——译者注

鲁文·达里奥（1867~1916）：尼加拉瓜现代作家，拉丁美洲现代主义诗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改变原本以模仿欧洲文学为主的拉丁美洲文学，开创了现代主义西班牙语文学。在拉丁美洲被尊为“诗圣”。代表作有《蓝》、《世俗的圣歌》和《生命与希望之歌》等。——译者注

爱丽儿主义：由乌拉圭思想家罗多（José Enrique Rodó）提出，他于 1900 年发表了长篇散文，以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里的一个角色《爱丽儿》命名该思想，提倡相对于“物质至上”的“精神至上”。——译者注

至是三手的。曾有过的与东方知识分子的联系非常有限而且纯属偶然；相反，同传播者们的交流却很多，特别是与那些将东方主义与蛊惑人心的渲染、与招魂术揉成一团的江湖郎中的交流很多。这一情况在 20 年代稍有好转。

墨西哥“文学会”的年轻人在上个世纪最初的 10 年里对印度斯坦文化产生了兴趣，同时在那个时代，神智学在一些不太体制化的知识阶层（他们往往远离大学、学术界和政党）、尤其是加入了知识分子队伍的女性中间获得了很多追随者。阿马多·内尔沃等伟大诗人已经完全是神智学者，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等女诗人也接触了这类信仰。在政界，包括墨西哥总统弗朗西斯科·马德罗（Francisco Madero）及阿根廷总统依波利托·伊里戈延（Hipólito Yrigoyen）在内的几位总统都曾宣称是东方神智学的拥护者。其中伊里戈延总统是一位学者，他曾通过福耶（Fouille）的著作研究了印度哲学和唯灵论。（Landa, 1958: 254）根据撰写总统传记的首位作者所述，伊里戈延除了是克劳泽派哲学家外，同时也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他“笃信超自然力，笃信人能亡人沟通”。（Galvez, 1939: 233）当伊里戈延被问及对招魂术的信念时，他通常宣称自己是唯灵论者，同时是他的朋友科斯梅·马里尼奥（Cosme Mariño）所领导的“持久”招魂术协会（La Constancia）的捐助者，而此举是为了感谢这位朋友在他身为政治反对派的困难时期所提供的庇护。据加尔韦斯（Galvez）说，伊里戈延从未提起过他对招魂术中心“潘乔·谢拉”（“Pancho Sierra”）的几次访问。（Santander, 1965: 158）

神智学与对混血文化有益论、平均地权论、“爱丽儿主义”或社会主义间所产生的融合非常重要。在神智学上的一致促成了知识分子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团结与联合。（Devés y Melgar, 1999）

人们把 20 世纪佛教在拉丁美洲出现的根源归于被称作阿那加利帕（“Anagaripa”）的尼泊尔人 Swami Jnana Kanda 所做的努力，他于 1913 年在泰国建立了“佛教传播联盟”，并在 20 年代上半叶在拉美多国（阿根廷、巴西、古巴、智利、多米尼加、厄瓜多尔、海地、巴拿马、秘鲁和委内瑞拉）开展了积极的宣传活动。现在在哈瓦那仍能看到 1925 年阿那加利帕来过的足迹。下列事实也肯定了佛教在拉丁美洲的传播：1930 年古巴人埃米莉亚·冈萨雷斯·德格劳（Emilia González de

Grau）的散文《佛陀与佛性》得以出版；流亡墨西哥的 Heramba Lal Gupta de Assam 教授在墨西哥国立大学开设了讲授佛学等东方文化的东方学课程，他的这门课程一直持续到 1947 年。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佛教社团在尼加拉瓜政治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在桑地诺解放阵线与索摩查政府间进行了受挫的调停。（Webb, 1988: 379 - 387）

关于马克思主义

鲜少有人知道，来自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东方文化早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就植根于拉丁美洲，远早于毛主义在该大陆形成的影响，我们将用较大的篇幅在本节叙述这一马克思主义系统的东方文化。我们认为，在拉丁美洲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中，明显存在着一种独特的东方影响，即来自颇有争议的共产国际的影响。“亚洲的觉醒”之说推动了一种革命政治意识的形成，这就是对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那些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来说的“东方道路”。共产国际所说的“东方”一般指非欧洲国度。

来自共产国际的东方影响促使一些亚洲官员在不太成熟的情况下与拉丁美洲进行了部分接触。证明这一推断的是，两位杰出的东方马克思主义者曾一度旅居墨西哥，他们是印度人罗易（Roy Manabendra）（1918 - 1920）与日本人片山潜（Sen Katayama）（1920 - 1921）。

片山潜是一位日本共产党员，被派往墨西哥负责对共产国际第一个拉美局进行重组。片山的思想引发了日本与墨西哥工人运动之间、亚洲与拉丁美洲工人运动之间的互动；日本、中国、墨西哥的工人运动受制于各自的文化视角和文化模式，受制于各自对帝国主义、革命、政党、工会等重要思想观念的看法，受制于各自在组织工作中积累的实际经验。1919 ~ 1921 年间，片山作品影响了拉丁美洲第一代共产国际成员。他所著的关于帝国主义、工人门罗主义以及东方革命等文章曾在布宜诺斯艾

然而，追寻东方文化如何在大众文化中传播这一庞大工程的踪迹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克劳泽派：德国哲学家卡尔·克里斯蒂安·弗里德里希·克劳泽（Karl Christian Friedrich Krause, 1781 - 1832）的学说。反对教条主义，支持学术包容与学术自由，寻求统一基督教有神论教条和泛神论的普遍概念。克劳泽创立了万有在神论，认为上帝包括世界又超越世界。——译者注

利斯及墨西哥出版。

1919年中旬，片山 宣传了自己的带有东方倾向的思想，这些思想与在刚成立不久的共产国际中占主导地位的欧洲中心论相悖，他甚至在拉美同一政治倾向的报纸上传播了自己的思想。在东京、大阪和京都的工人运动动荡和高涨周期结束后，片山写道：“……我们高兴地看到，日本无产阶级已经能够对付世界上最强大的官僚统治之一……对世界无产阶级最有意义的，是随着社会革命到来的日本工人阶级的觉醒”。（Katayama, 1919 - a: 11）片山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版的分别关于中国与日本的两篇新文章为他的东方式阐释划上了句号。基于旅墨期间的坎坷经历和悲观体验建立的拉美观，再次肯定了片山对欧洲以外地区革命进程的敏锐的东方式阐释。我们看到，片山在对动荡的亚洲大陆的东方式解读中，并不热衷于日本所扮演的角色，这与他对中国革命潜力的理想化评价非常不同。片山写道：

“……中国实质上是一个民主国家，更确切地说，中国人对于民主思想及革命思想更开放，因为在中国民众中存在着更加强烈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精神使中国人比带有军国主义思想的日本人、比那种习惯于秩序的人群更适于接受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当中国越过目前的冷漠态度、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我管理之后，她将变为远东地区占主导地位的强大国家，同时日本则将受制于这个亚洲人口最多的国家。”（Katayama, 1919c: 15）

罗易的思想影响大于片山。罗易在墨西哥大约生活了三年，这一经历不仅扩展了他对印度民族主义式的解读，同时也使他在 1920年成为欧洲中心式的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和政治上的第一道裂隙的始作俑者。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罗易说服列宁支持已经开始叫响的“东方之路”，很明显这个术语的宽泛含义在广义上囊括了拉丁美洲。罗易建议的重要意义在于，他把农民看成欧洲以外世界、特别是亚洲大陆上那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最重要的角色。在 1922~1924年间，罗易为共产国际第四次和第五次代表大会拟定了最初的两份亚洲国家的人类种型学，第一份基于经济标准，第二份根据在社会阶级分析基础上的更政治化的标准建立。罗易就这样巩固了共产国际内部东方问题研究的亚洲分支的根基。

在拉丁美洲，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

（José Carlos Mariátegui）是唯一关注共产国际内就殖民和民族问题争论结果的人。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所写的第一批有关系列文章完成于 1924年 9月 27日到同年 11月 1日间，这并非出于偶然。马利亚特吉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闭幕不到两个月之后回顾了土耳其、中国、印度、爱尔兰和埃及的经验，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结论和思考。

在 20年代前期，亚洲革命与民族主义运动的高涨浪潮唤醒了拉丁美洲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兴趣。经过大学改革运动洗礼的年轻学者与政治家面对精英化的陈旧的实证主义语言，有意识地寻找“新思想”和“青年的导师”，同时利用纪念独立运动一百周年庆祝活动之际再次举起反对殖民主义的大旗。大学改革派一代人主办的刊物都登载过宣传亚洲民族主义与唯灵论以及从政治上鼓吹亚洲反殖领袖人物的文章。他们当中，胡里奥·安东尼奥·梅利亚（Julio Antonio Mella）与另外 10位签名者“革新集团”与《大学杂志》于 1923年向古巴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提出一项动议，要求拉丁美洲各国人民与某些亚洲国家人民在斗争中团结和相互支援：

“在当前全球不公的背景下，毫无疑问，帝国主义国家虚伪的宣言为其相应国家的金融寡头政治服务，形成了一种对罪行、掠夺和压迫的全球性沉默，损害了人民自决权并阻碍了人民的不断进步。”

“第一届全国学生代表大会反对对安第斯人民、中美洲人民、菲律宾人民、爱尔兰人民、埃及人民、印度人民及摩洛哥人民的践踏，并完全支持上述国家人民获得真正自主权，而且要求古巴政府承认他们为获得这一权利所进行的斗争。”（Mella, 1964: 95）

（翻译 韩晗；校译 刘承军；责任编辑 黄念）

片山潜 1890年左右居住在美国时是一位基督教信徒。他与十几位同为基督教信徒的年轻人一同居住于旧金山，于 1897年创立了青年基督教协会，旨在推动工会运动。1898年，包括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及其他基督教徒聚集在东京 Unitarista教堂周围，片山也在其中，他们创立了社会主义研究团体。1901年，该团体成员创建了社会民主党。1904年片山参加了在阿姆斯特丹的第二国际委员会。在日本政治镇压时期过后，他接触了第三国际并成为了真正的革命者，在苏联建立前，赴美国及墨西哥工作（Muel, 1970: 183ss）。

何塞·卡洛斯·马利亚特吉（1895 - 1930）：秘鲁思想家，拉丁美洲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主要著作有《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译者注